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巴 蜀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3

巴蜀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13卷

巴蜀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段書安

排版者 北京迅即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四年六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0-0773-X/J·267

(京)新登字〇五六號

國內版定價 二八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西南地區古代巴蜀兩族創造的豐富的物質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境內，其時代大約自商代至西漢中期。神秘而奇特的巴蜀青銅器，代表了巴蜀文化的最高成就。巴蜀青銅器是在黃河流域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巴蜀青銅器主要器類可分爲人獸雕像、禮器、兵器、樂器、工具、印章等。近年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立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神樹、鳥獸等青銅藝術品，至爲珍貴。鑄造精美、形象生動、裝飾華麗的巴蜀青銅器，是中國青銅藝術寶庫中的重要部分。

本書精選巴蜀青銅器一百六十件，全面反映了巴蜀青銅器的歷史風貌。

中國青銅器全集

- | | |
|------|-------|
| 第一卷 | 夏、早商 |
| 第二卷 | 商(1) |
| 第三卷 | 商(2) |
| 第四卷 | 商(3) |
| 第五卷 | 西周(1) |
| 第六卷 | 西周(2) |
| 第七卷 | 東周(1) |
| 第八卷 | 東周(2) |
| 第九卷 | 東周(3) |
| 第十卷 | 東周(4) |
| 第十一卷 | 東周(5) |
| 第十二卷 | 秦漢 |
| 第十三卷 | 巴蜀 |
| 第十四卷 | 滇、昆明 |
| 第十五卷 | 北方民族 |
| 第十六卷 | 銅鏡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世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杜迺松（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李中岳（文物出版社副社長 副總編輯 高級編輯）

李國樑（安徽省博物館研究員）

吳鎮烽（陝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段書安（文物出版社副編審）

俞偉超（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教授）

陶正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

郭素新（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國生（文物出版社副編審）

張長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增祺（雲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顧問

楊 瑾（文物出版社社長 總編輯 編審）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楊錫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趙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副研究員）

熊傳薪（湖南省博物館館長 副研究員）

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凡例

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共十六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青銅器發展面貌。

二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為主，酌收有代表性的傳世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三 本書為《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三卷，選錄巴蜀青銅器精品。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巴蜀青銅器概論

趙殿增

中國西南的四川盆地及其附近的廣大區域，古稱『巴蜀』。先秦時期這裏曾建立過『巴』、『蜀』兩大古國，創造出了璀璨輝煌的『巴蜀文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八十年代的考古新發現，證明從距今三四千年到兩千年以前，這裏已具有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神秘而奇特的巴蜀青銅器，代表了巴蜀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器群的發現，轟動了海內外。這裏發現的立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神樹、鳥獸等青銅藝術品多達六百餘件。形體碩大、形象奇特、造型優美、內涵深邃，不僅為中國青銅文化所稀有，而且在世界青銅藝術中也極為罕見。

巴蜀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至今已延續了半個世紀。早在本世紀初，一些巴蜀兵器被陸續發現，但當時并不知其為先秦巴蜀遺物，誤將它當作是『夏式劍』（周偉《中國兵器史稿》等）。三十年代前後，在廣漢月亮灣一帶發現了大批玉石器，並進行了正式的考古發掘，提出了『廣漢文化』的概念，但當時這裏並未發現青銅器。四十年代初期，一批學者陸續來到四川，他們在成都舊貨市場上發現很多形制奇特的青銅兵器，據查多出於成都西北郊白馬寺一帶。衛聚賢等學者在《說文月刊》上公布了這一發現，正式提出『巴蜀文化』的命題。五十年代初，寶成、成渝鐵路建設中，發現了眾多的『船棺葬』，以巴縣冬筭壩和昭化寶輪院墓群最為重要，不僅明確了巴蜀青銅器的出土狀況，而且開始認識了青銅兵器與容器、印章的時代特徵和組合關係。一九五六年新繁水觀音遺址的發掘，一九五九年彭縣竹瓦街銅器群的發

現，進一步認識了商周時期巴蜀銅器的特點。七十年代之後，巴蜀文化考古掀起了一個高潮，一九七二年在涪陵小田溪發掘了巴王族陵墓，一九八〇年在新都發掘了蜀王大墓，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二年蜀國故都『三星堆古城』的考古新發現，相繼取得重大成果。這一時期還在成都、大邑、蒲江、彭縣、郫縣、廣漢、什邡、綿竹、榮經等地發現衆多船棺葬墓地，在峨嵋、犍爲、蘆山、漢源、寶興以及成都附近發現了大批土坑墓群，其中以成都最爲集中，以綿竹、什邡、榮經、峨嵋、寶興、茂縣等墓群較爲重要。八十年代的文物普查、文物鑒定和搶救發掘工作中，在東起巫山、達縣，西到汶川、石棉，南至越西、會理、瀘州，北到廣元、青川的廣大區域內，都發現了巴蜀銅器，幾乎遍布了四川盆地全境。和四川相鄰的陝西漢中、寶雞，湖北宜昌、荊州，以及湖南、貴州、雲南、甘肅等省，也都有巴蜀青銅器出土。巴蜀青銅器發現地已達百餘個縣市、數百個地點。可以說，目前已初步認識到歷史上曾存在過這樣一個獨具特色的『巴蜀文化區』，在一千多年的歷程中，形成了巴蜀青銅文化體系。

二

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過程，從商代開始，歷經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各時期，在西漢中期基本結束，前後長達一千多年。從器物的種類、作風看，巴蜀青銅器可以明顯地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相當于商至西周，以成都平原祭祀坑、窖藏出土物爲主，也包括分布在四川各地的一批商周青銅禮器。典型器物除三星堆大型人像、動植物造型之外，還有以壺、尊爲主的青銅禮器和戈、矛、鉞等青銅兵器，多具有濃厚的宗教祭祀和禮儀性質。後期爲春秋晚期、戰國，直到西漢初期，以各種類型的墓葬中隨葬的青銅器爲主，典型器物爲成套的『巴蜀式兵器』（柳葉劍、三角形戈、烟荷包式鉞、長戣矛）、成組炊容器（釜、釜、甑）和肖形圖語式的印章。前期後期之間又有密切的文化聯繫，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序列。

巴蜀青銅器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商代早期，是巴蜀青銅器的誕生期；第二階段：商代中晚期，是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前期巴蜀青銅藝術鼎盛期；第三階段：西周時期，是巴蜀青銅器的完善期；第四階段：春秋晚期到戰國早中期，是後期巴蜀青銅器的形成期；第五階段：戰國晚期，從秦并巴蜀前後到秦統一全國之前，是晚期巴蜀青銅器的擴展期；第六階段：秦代到西漢前期，是巴蜀青銅器的衰變期。前三個階段（商代到西周）為『巴蜀青銅時代前期』，後三個階段（春秋戰國到西漢中期）為『巴蜀青銅時代後期』，或稱『晚期巴蜀文化』。

巴蜀青銅器大約起源于商代早期。從殷商時期的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群高度發達的技術水平和成熟的造型特徵分析，在此之前，巴蜀青銅器已經有一個相當長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目前發現的一些線索，為探討巴蜀青銅器的起源和早期面貌，提供了寶貴的信息。

一九七六年在三星堆遺址以西的高駢鄉磚廠一個淺坑之中，出土了一組造型古樸的玉石禮器和一件長方形的銅牌飾（原定名『銅嵌飾』）。牌長十二點三、上寬五、下寬七點三厘米。牌身呈圓弧狀隆起，兩側各有一對繫耳。牌面上有鑲嵌綠松石的幾何圖案，自下而上，形狀近似于嘴、鼻、眼、眉和額心裝飾，共同組成了一個獸面形。它與一九八一年河南偃師出土的二里頭文化『嵌綠松石饕餮紋牌飾』的形制、作風大體相似，時代約為商代早期。同出的玉刀、玉斧、玉矛，也都具有夏商時期玉器的風格，與銅牌的時代特徵相一致。

一九八七年在廣漢三星堆遺址內，又發現了兩件形制相似的銅牌飾，均出土于遺址東北部一個小型器物坑中，同出的還有璧、環、斧、鑿等玉石禮器。其中一件牌飾長十三厘米，為上寬下窄的長方形，下端呈圓弧狀，兩側有對稱的兩組繫耳。牌面微凸，中軸貫穿，兩側鏤空三對枝杈，組成對稱的圓圈紋、勾雲紋，其間鑲嵌綠松石。整個圖形象一具變形的獸面，以圓圈、枝杈等分別表現眼、眉、鼻、嘴和額飾，圖形趨于圖案化，但總體形態風格仍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牌飾相似。另一件銅牌飾，長十四厘米，器身兩側有對稱的四個繫耳，正面紋飾進一步圖案化：中央一主干上下貫通，兩側各有五組相互對稱的『S』形鏤空勾雲紋，空隙處用鏤空的三角紋填補。該牌飾獸面紋的形態已不明顯，但仍然有上述諸牌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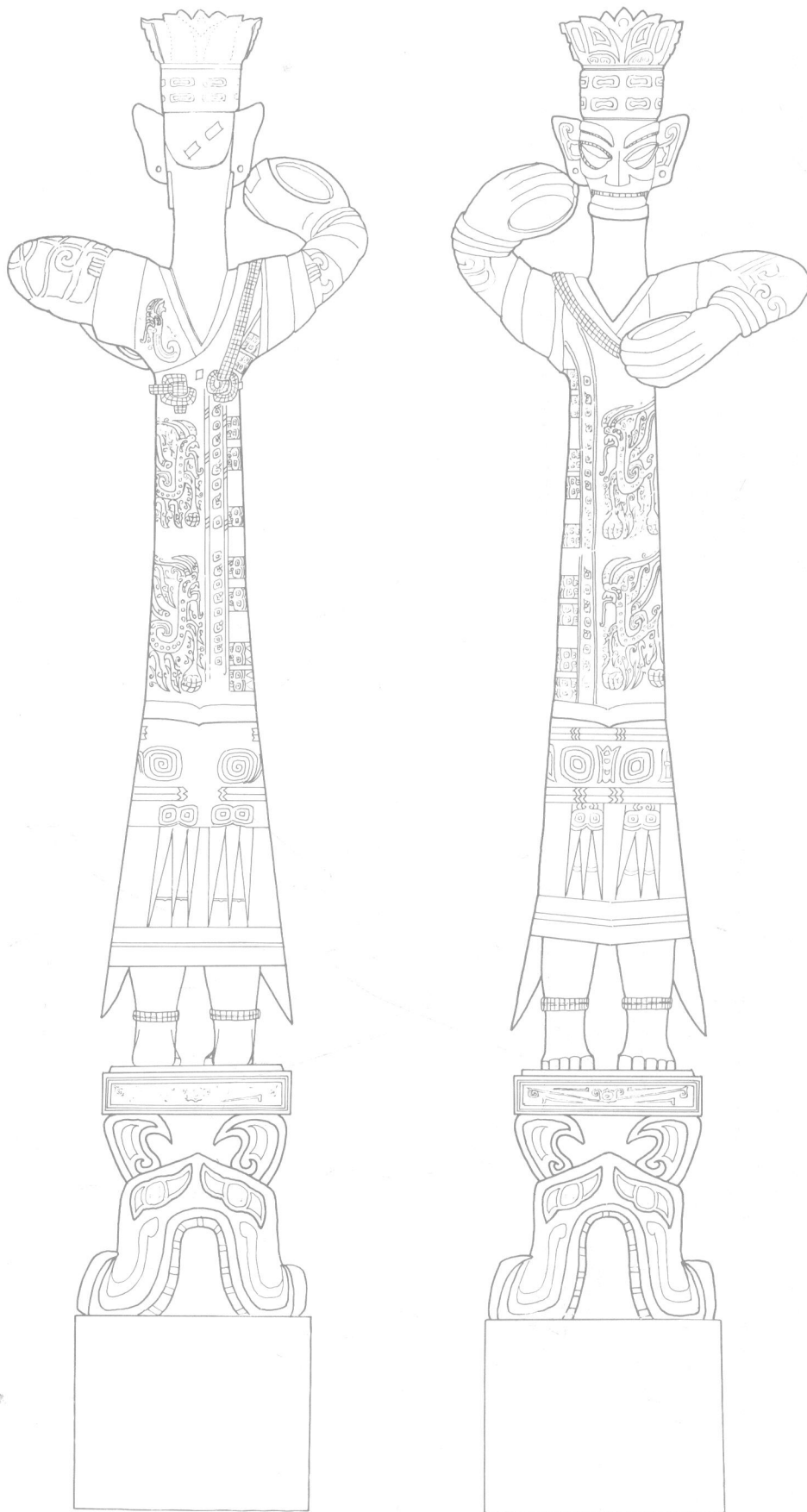
的造型風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先生從國外收集了九件同類的獸面銅牌飾資料加以排比研究，確定其時代為二里頭文化晚期到商代早期。他認為三星堆附近出土的這些銅牌飾屬於同一類型，四川的這些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銅牌飾之間有一定的文化聯繫。四川早期巴蜀青銅器正是在夏商青銅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時代約為商代前期。與銅牌時代相近的巴蜀銅器，還有漢源背後山出土的形制簡約的兵器和工具。如方形銅鉞、扁平式銅斧、銅鑿等。一九五七年新繁水觀音出土的一組兵器，部分學者認為屬於商代早期，近年十二橋遺址等處的考古發現證明此說是正確的。如銅戈扁平細長，內、闌、援部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器小體薄，具有早期青銅器的特徵，近似于鄭州白家莊出土的商代早期銅戈。

綜上所述，四川廣漢、新繁、漢源等處所出土的青銅器，形制簡單，造型古樸，既有一定的地方文化特色，又與商代早期中原青銅器相近似。因此可以把這組青銅器作為巴蜀青銅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年代大體相當于商代早期，即公元前十六至十四世紀。

商代中晚期，商文化與蜀文化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逐步交匯于陝西漢中地區，它們互相撞擊，互相融合，產生了一組形制獨特、紋飾豐富、種類齊全的青銅器。近二十多年來，在漢中的城固、洋縣一帶，發現了眾多的窖藏銅器，出土了五百多件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青銅兵器和禮器。北京大學考古系李伯謙先生將它們分為甲、乙、丙三組。甲組銅禮器，如尊、甗、壺等，為典型的商代中原式青銅器；乙組包括三角援戈、弧刃直內鉞、等腰三角形戈（戣）、長援直內戈等兵器，數量最多，地方特色也比較明顯；丙組為圓刃方銎人面形鉞、人面具、牛頭形鋪首等。李伯謙先生認為乙組、丙組為蜀式青銅器，大部分學者也認為這些銅器與蜀有關。特別是其中數量最多的三角援戈，已具有典型巴蜀式兵器的基本特徵，可能是巴蜀青銅器的重要源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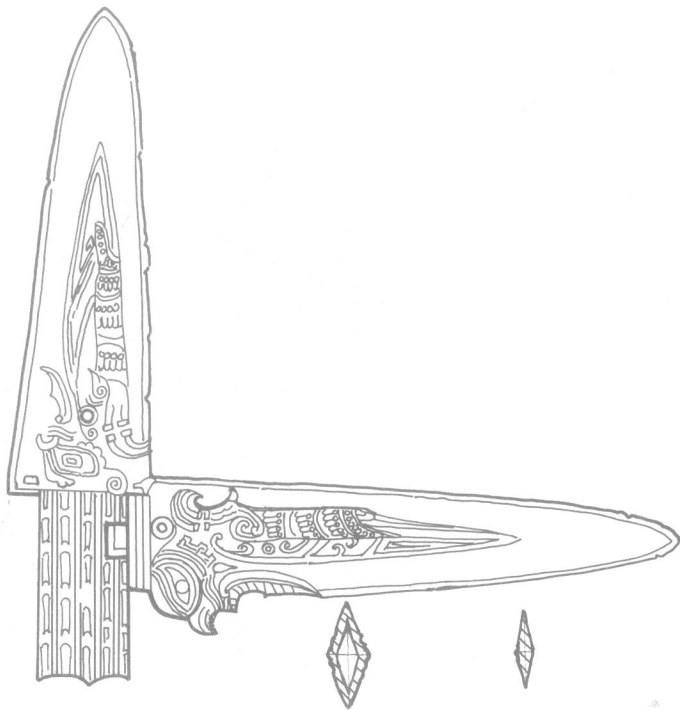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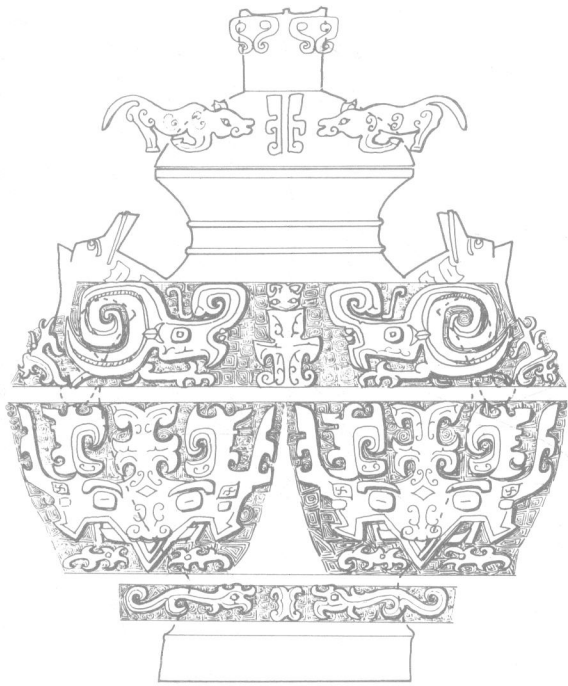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數百件相當于商代中晚期的青銅器，代表了巴蜀青銅藝術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構成巴蜀青銅器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時期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是大批青銅人像和動植物等造型。人像有大型立人像（插圖一）、小型祭祀人像和人頭像。其他器類有突目人面具、平目人面具，有獸面和人首鳥身銅像，有大量人眼形飾件，還有龍、虎、

插圖一 立人像



蛇、鳥、鳳、鷄等動物和樹、葉、花、果等植物造型。這批青銅藝術品，形體碩大、造型優美、數量眾多，在東方青銅文化中獨樹一幟。這一時期的青銅禮器，以壺和尊為主，在借鑒中原同類器物造型藝術的同時，形成和發展了自己的造型風格和裝飾特色。同時出土的鋸齒狀長援戈、方形與圓形琕、動植物形或獸面紋銅鈴、鳳鳥狀的銅牌掛飾，均有獨特的地方特徵，既反映了其功能上的神秘性，又表現了早期巴蜀青銅藝術的獨特面貌。太陽形飾件等

插圖二 蟠龍蓋獸面紋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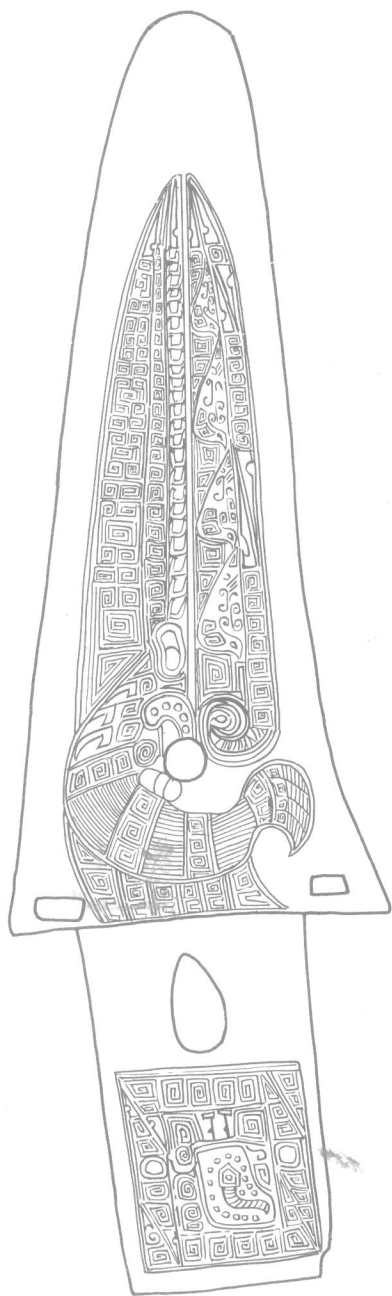


插圖三 鳥紋戟

器物，更有濃厚的宗教意義。這一批用于祭祀禮儀的大型青銅器，是巴蜀青銅器中的杰作，體現了巴蜀青銅文化前期的典型風格。廣漢城西單獨出土的一件銅尊和三星堆遺址西北部出土的一件嵌綠松石銅虎牌飾，均具有商代風格，與三星堆祭祀坑的時代大體相當，為殷商時代巴蜀青銅器中的珍品。

西周時期，以彭縣竹瓦街出土的兩組青銅器為代表，標志着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的典型器物，是禮器中的壘與尊和兵器中的戈、矛、戟、鉞。壘是這時期巴蜀禮器的核心器物，不僅數量多、分布廣，而且造型宏大、裝飾精美。一九五九年彭縣竹瓦街出土的第一組八件容器中，壘就占有五件。一九八〇年竹瓦街出土的第二組銅器中，四件容器全部是壘，最大的一件人面獸紋壘，高七十九、腹徑四十一厘米，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同組中的象頭飾獸面紋壘、蟠龍蓋獸面紋壘（插圖二）、圓渦紋壘，也都各具風采。

插圖四 蠶紋戈



竹瓦街的青銅兵器，形成了自己造型精緻、紋樣華麗的藝術風格。銅戈的主要形式是無胡長援，上面飾有精細的鳥紋或獸面紋。銅鉞呈舌形，空釜圓刃，體碩大，飾牛頭等紋飾。銅矛則為長戟、附耳，葉部寬圓，身飾半浮雕的壁虎紋或蟬紋。此外還有由戈與刺組合成的銅戟，飾鉤喙鳥頭，頗有特色（插圖三）。

在四川各地出土有一些西周前後的青銅禮器，以壘和尊為主，器物宏大而精美。如巫山縣大昌附近出土的銅尊，與三星堆及湖南、安徽的銅尊很相似，可能為殷商時期遺物；簡陽出土的銅壘，肩飾圓渦紋，腹飾三角形獸面紋，羊首耳附加圓環，莊重而華麗，時代與竹瓦街銅器相當或稍晚；成都南一環路出土的羊首附耳獸面紋壘，高六十五、腹圍一百六十二厘米，重三十五公斤，肩寬體大，凝重沉穩，肩飾雲雷紋，腹飾垂葉紋，頸部飾斜角勾雲紋，具有西周中晚期的風格。這些大型禮器，基本都是單件獨出。可能是祭祀儀式後埋存的禮器，表明這時巴蜀境內部族方國勢力逐步壯大起來，開始使用自己的青銅重器。成都交通巷出土的一件蠶紋戈，為無胡長援形，本部略曲，與竹瓦街的青銅戈器形相近，為西周遺物。戈兩面飾繁縟的獸面紋，內上一方形圖案，中部為一卷曲的『蠶』紋，蠶的發現，對研究當時社會經濟很有價值（插圖四）。

西周時期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是一大批近似于巴蜀風格的青銅器出現在陝西寶

雞地區，集中表現在寶鷄茹家莊、竹園溝西周早中期的獬廌墓地中出土的兵器 and 特殊容器上。一些學者將它們定為『蜀式兵器』，其中僅蜀式戈就有五十餘件，形制紋飾多與漢中及竹瓦街銅戈相似，其中『等腰三角形戈』，是四川晚期巴蜀文化中此類銅戈的祖型之一。特別是竹園溝墓群出土的『柳葉形短劍』，更是晚期巴蜀文化最常見的『柳葉劍』的初期形態。這批銅器已大體包含了典型巴蜀青銅兵器的基本種類和特徵，它對春秋戰國時期廣泛出現在四川盆地及周圍地區的『巴蜀式兵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獬廌墓地青銅器是巴蜀青銅器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個獬廌氏方國，與川西蜀人有着密切的關係，有可能就是古蜀人的一個重要文化分支。

春秋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典型器物，包括以釜、釜、甗為代表的容器和組合完整的各式兵器、工具、巴蜀式印章等。銅尊等大型禮器基本消失，銅壘形制發生較大變化。銅鼎開始出現，但數量不多。埋存形式也從商周時代的祭祀坑、窖藏演變為以墓葬為主，包括了船棺葬、木槨墓、土坑墓等形式。從此，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進入了『晚期巴蜀文化』階段。時代大約自春秋中晚期起，歷經戰國、秦，直到西漢中期。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早中期，巴蜀青銅器進入第四階段，這一時期，也是後期巴蜀青銅器的形成期，典型墓葬主要集中在成都西郊及附近市縣。成都西郊以百花潭十號墓、三洞橋古墓群、白果林船棺葬、羅家碾土坑墓等為代表。附近市縣則以新都馬家鄉大型木槨墓，大邑五龍四號墓，蒲江、彭縣船棺葬為代表。晚期巴蜀青銅器的基本組合和典型特徵，到這一時期已比較完備。如百花潭十號墓出土了單耳釜、釜、連體甗、尖頂尖底盒形盒、柳葉短劍、三角形戈、十字形中胡戈、長方形空釜以及斧、鑿、刀、勺等工具，種類豐富，組合完整。墓中出土的一件『採桑攻戰圖嵌錯銅壺』，刻劃大量建築和人物活動的畫面，還有神奇的動植物圖案。銅壺為巴蜀本地鑄造，工藝、造型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新都馬家鄉大型木槨墓，有長九點三、寬六點七米的大型木槨和五米多長的墓道。僅在木槨下面一個保存完好的腰坑之中，就存放着一百八十八件精美的青銅器，是晚期巴蜀文化中層次最高、品種最多、

組合最齊的一組青銅器。隨葬的銅器以五件或兩件完全相同器物爲一套。禮器有鼎、壺、壘、釜、盞、豆、三足盤、匕、編鐘、鎛、鑑、甗、豆、敦、甗、盤、匜，兵器有戈、劍、鉞、矛、刀。工具有斧、鋸、鑿、削、斤、雕刀，共有四十三套之多，反映了巴蜀青銅禮器極爲嚴謹的組合規律。它代表了晚期巴蜀青銅文化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高峰。同墓出土的印章，說明墓主人是最後幾代蜀王之一。

戰國中期，即公元前三一六年前後，秦國兼并了巴蜀。從這時起直到戰國末期，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進入了第五階段。這一階段巴蜀雖然納入了秦國的版圖，但由于對這一地區採取的是羈縻式的松散管理方法，巴蜀文化的特色得以繼續保持下來，并有了新的發展，大量出現了以船棺葬爲特徵的墓葬形式。這一時期又由于有不少秦、楚文化因素的傳入，與巴蜀文化互相交融，因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風貌。

戰國中晚期典型的巴蜀銅器群，有巴縣冬筭壩、昭化寶輪院船棺葬、綿竹清道的船棺葬、涪陵小田溪巴王陵墓葬群。同一時期的巴蜀墓葬，在全川各地乃至陝南、鄂西、湘西、雲南、貴州等地都有發現。四十年代收集的第一批『巴蜀式銅器』，也基本屬於這一階段的遺物。銅器數量之大、分布之廣、兵器之多、印章之繁，都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從器型特徵看，這一階段基本上延續了戰國早中期巴蜀銅器的風格和組合規律。同時，隨着時代、地域和墓主身份的變化，器型又有一定的發展。冬筭壩和寶輪院的船棺葬中所出兵器，爲寬柳葉形劍，『烟荷包』式空釜圓刀鉞，中長戟或長戟式圓弧刀矛，三角形戈或中胡長胡式戈等。釜釜多爲雙耳，甗爲上下分體。工具有鑿、斧、削刀、帶鉤等。特別是動物肖形和『巴蜀符號』紋樣的印章大量出現，形狀多樣，印文繁縟，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徵。新出現的重要文物，有『秦半兩』、『兩留』銅錢、長胡三穿戈（戟），還有精美的犀牛式帶鉤、琵琶式帶鉤、新形式柳葉劍等。兵器和印章上的『巴蜀符號』特別繁復，也是這時的特徵之一。涪陵小田溪發掘的土坑墓，是秦并巴後巴人王族後裔的墓地，出土的青銅禮器規格高，不少爲精美之作。其中戈、劍、鉞、矛等兵器和釜、鑿、甗等容器與船棺葬出土器物基本相同。新發現的有一組十四件錯銀編鐘和錯銀銅壺、渦紋銅壘，以及虎鈕錙于、鉦、弩機、鏤空雙龍

方鏡，既有戰國晚期的時代特徵，又有川東巴人的地方文化色彩。這一時期在各地出土的巴蜀銅器，基本組合大體相同，也有不少形制、紋飾奇特的精品出現，如榮經、蘆山的數十枚印章，峨嵋符溪的鳳鳥紋戈，廣元的動物紋戈、錯銀銅壺，綿竹清道的嵌錯方壺等，呈現出了繽紛多彩的繁榮景象。

巴蜀青銅器的第六階段，包括從秦統一後到西漢前期，是巴蜀銅器的衰落時期。這時，秦漢政權在巴蜀地區已建立了較穩固的統治，中原文化對當地文化的影響也在增強。秦、蜀、巴、楚文化的相互融合，促使巴蜀青銅器又出現一些高水平的珍品，這一時期船棺葬逐漸減少，長方形、方形等土坑豎穴墓盛行，木槨墓增多，還出現了一種『木板墓』，為船棺葬向木槨墓過渡的形式。典型的銅器群有羊子山一七二號墓，綿陽木板墓，奉節風箱崖懸棺葬等。以羊子山一七二號墓最為突出，器物有釜、甑、鼎、壺、盤、匜、盃、爐，兵器有矛、鏃、弩機，還有鏡、印、帶鉤等。其中約有三分之一保持了巴蜀銅器原有風貌，另有一些是發生演變後的新器型，更多的則為典型的秦代器物。巴蜀式的柳葉劍、烟荷包劍已基本消失，僅有長戣矛、三角戈尚有巴蜀兵器特徵。多數兵器如劍、矛、鏃、弩機等，均為典型的中原形式。禮器中的壺、釜、盤、甑，則是在巴蜀器物基礎上加以變化，吸收了一部分中原風格。大鼎、蓋鼎、三足爐、盃，雖然為本地製作，但秦漢銅器風格已占主導地位。在用具和雜器中，帶鉤、鋸、鏡上還有巴蜀文化餘韻，加之盤、壺、印章上尚有的『巴蜀符號』，表明羊子山一七二號墓仍屬於巴蜀文化的範疇。這一時期綿陽、綿竹、犍為、成都等處的銅器群，巴蜀式兵器還占主體，但中原銅器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大，『巴蜀符號』紋飾和印章減少或消失，漢字印章占主體，還出土有『八銖』、『四銖』等漢初半兩銅錢。例如奉節風箱崖懸棺葬隨葬品中，既有寬刃柳葉劍、方形斧等巴蜀銅器，又有新形式劍、鵝形帶鉤等中原式銅器，還出土一件典型的西漢文帝『四銖半兩』銅錢，其時代已到了西漢前期。其中一件精美的雙獸紋鍍金銅帶鉤，可以說是巴蜀青銅器消失前的一縷餘輝。到漢武帝前後，政治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全國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各地文化經歷了一次大融合，巴蜀文化最終匯入了漢代文化的大潮之中，巴蜀青銅器也結束了它一